

■新作聚焦

高建国报告文学《渡江南进》： 伟大历史时刻的深情回眸

□马楠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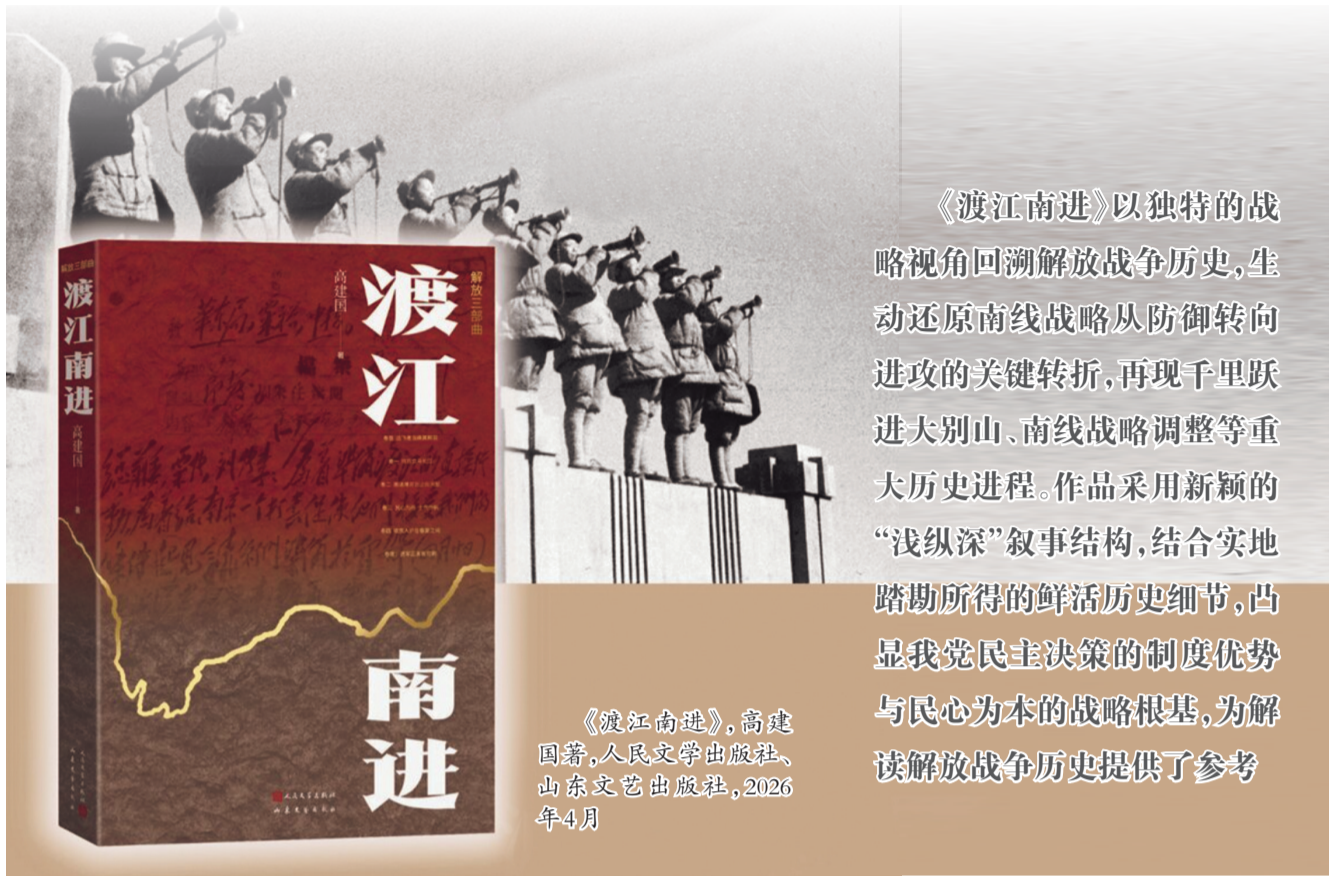
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已经远去80年，今天的作家应当怎样回眸和再现这场改变了中国前途命运的战争？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高建国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渡江南进》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手法，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历史回眸，为读者打开了解读历史的新窗口，读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在专著《战争论》中给战略下了这样的定义：“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应用”，战略在它的最高范围“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影响和改变历史的恢宏战略，总是在激烈的对抗和严酷的锻打中迸发出璀璨光彩。黑云压城的1947年春，蒋介石推出“黄河战略”，以“双矛攻势”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3月18日，毛泽东率“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离开延安，转战陕北沟壑梁峁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胡宗南率25万大军紧追不舍，毛泽东为引敌留陕决不东渡黄河，但陕北的贫瘠导致部队衣食难以继。7月29日夜，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要求以“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毛泽东的这封深夜急电，让刘邓二人意识到陕北乃至全局的危急态势，也明确了中央已下定的战略决心。他们当机立断，率部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当晚部队立即停止刚开始的休整，义无反顾挺进大别山。《渡江南进》开篇即以转战陕北为叙事背景，在敌军重兵围追、山川险峻的紧张气氛中，生动勾勒出南线战略从酝酿到部署再到实施的全过程，凸显毛泽东于马背和窑洞指挥千军万马绝地反击，开创世界正义战争在非优势条件下主动实施战略进攻的非凡先例。

作者从多重视角还原历史现场，以世界战争史上战略反攻史实为参照，聚焦国共较量中把战场摆在谁家地盘、交战双方由谁“管饭”这一核心命题，从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直击战略博弈的要害。早在井冈山反“围剿”时期，毛泽东就识破蒋介石的把戏，在内线大量歼敌的同时，适时将兵锋指向蒋管区。陕北转战之际，他依然秉持此策。那“马背上的神来之笔”，最终照亮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险途，也成就了扭转敌强我弱战局的重大战略转机。作品通过独特视角，别开生面地呈现了解放战争伟大战略转圈的内在逻辑。

作品采用了独特的“浅纵深”结构，为其纷繁的历史叙事提供了适宜框架。作品以宽视角描述扣人心弦的历史场景，横宽纵纵的结构便于多头平行叙事和短时间交叉叙事同步推进。结构决定功能，这种短流程、快节奏、多节点的叙事方式，使作品紧凑明快，在频繁转换和交错展开中强化了时代氛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从战略层面进行历史回眸，使作品有了与众不同的“纲”和“魂”。《渡江南进》不写解放战争全貌，也不拘泥于一城一役，而是截取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一个关键节点，聚焦南线战略调整带来的历史之变，生动再现了从精兵跃进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性飞跃。以南线战略调整为“文眼”，这样的立意和谋篇布局既是全书的纲，也是全书的魂。作者从战略这个新的视角回眸历史，使作品在同类书系中有了较高辨识度的“脸谱”，也有了区别于其他战争纪实的“代码”。

《渡江南进》的另一大看点是生动翔实地再现了南进战略



《渡江南进》，高建国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2026年4月

调整的别样精彩。1948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组建东南野战军及第一兵团，准备实施第二个战略跃进。粟裕在积极备战南渡的同时，经缜密推演，综合分析了敌我双方兵力构成、装备特点、南北地理环境对作战的影响等因素，三次电告中央军委，“斗胆直陈”暂不渡江南进，建议聚力江北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从善如流的毛泽东在河北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此后，南线我军相继发起豫东、济南、淮海战役，基本肃清江北之敌，为渡江南进打开了宽广的战略通道。

作品将我军善纳群智、博采众长的科学民主决策模式，与蒋介石通过“官邸作战会报”遥控指挥、将精锐兵团相继送入覆灭陷阱的独断专行进行对比，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决策机制与制度优势。作者满怀敬意地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是一团和气的江湖同仁，他们目标一致，有着百川归海的强大凝聚力；但又和而不同，在民主集中制根本制度下保持着各自独立的思考。”这样富于质感与张力的语言，引领读者登高望远，从而领略到战争之外的星辰大海与丰赡意蕴。作品以这种别具一格的哲理、政论、文学三位一体的“旁白”和“画外音”，为特定时代的人与事点睛传神。

作者走进历史深处打捞诸多珍贵细节，为作品注入了鲜活的血肉。《渡江南进》既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影响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抉择传神写照，又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情节，使抽象

《渡江南进》以独特的战略视角回溯解放战争历史，生动还原南线战略从防御转向进攻的关键转折，再现千里跃进大别山、南线战略调整等重大历史进程。作品采用新颖的“浅纵深”叙事结构，结合实地踏勘所得的鲜活历史细节，凸显我党民主决策的制度优势与民心为本的战略根基，为解读解放战争历史提供了参考

的战略生动可感、呼之欲出。作品坚持历史真实与文学表达的有机统一，精选历史片段与细节，以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内敛深沉的叙事，展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彰显人物个性命运和战略推进的宏阔气象。

为保证作品真实可信，作者重返历史现场，实地踏勘南北两线相关战地。在“历史拐弯”的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他获取了粟裕夜访毛泽东这一珍贵细节，借助毛泽东住过的那把帆布躺椅，引出毛泽东转战陕北一路伴行的躺椅、柳木棍、破棉袄“三件宝”，为生动再现毛粟夜话营造出弥足珍贵的历史氛围。作者行走陕北期间，了解到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毛泽东摆脱胡宗南追击后，坐在山腰大青石上哼唱京剧《空城计》；周恩来在中秋夜给邓颖超写“情书”；我军歼敌三万余并击毙中将军刘戡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跳起秧歌舞、任弼时拉胡琴伴奏等。这些都成为作品丰肌秀骨的好材料。

这些鲜活细节，为宏大的战略叙事注入了温度与质感。而作者笔锋所向，最终归结于一个根本命题：战略的棋眼在于人心。全书字里行间无不表明，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是我党我军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根本着眼点与落脚点。正是因为人民军队全身心地为人民英勇奋战，才赢得了人民的竭诚拥护和支持。千百万群众摇旗呐喊，与官兵生死与共，携手突破长江天险，就是历史对渡江南进大业作出的最恰当的评价。

(作者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第一感受

对中国当代文坛而言，季进是一个特殊的观察者——“入乎其中，又出于其外”，是对他评论姿态的恰切形容。这本《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前四辑，是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实地观察，笔涉当代文坛名家近年来的新作；从阿来的《云中记》到麦家的《人生海海》，从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到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从王尧的《桃花坞》到莫言的《鳄鱼》……一本评论集选定的篇目，体现出一个评论家面对文坛手持着怎样的取景框，而这些篇目如何被厘清、整合，则能体现出这个取景框背后的支点。“讲故事的人”“人间世相”“历史镜像”“生命的共情”这四辑的命名恰是这一支点的直接外现，显露出季进在对待作品的丰富景深时，如何截取属于他的那一层，又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看起来，这样的厘清和划分是为了归纳，但归纳在终极上是为了生发和演绎，所以这些看起来各自独立的章节，叫人想起秘鲁作家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略萨将“中国套盒”（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物理形态比喻成一种小说架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且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作品的章节犹如这些层层生发的、看似并置的故事，全书更引入了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在后两辑“世界中的流播”和“理论的观照”中显露——季进不仅是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研究海外汉学、现代文学中外关系的学者，所以，他笔下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中，一直都暗含着一个将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范畴内考量的视野。

读过第五、六辑里那些将中国当代文学置入世界情境的研究文章后，再读第一到第四辑的作家作品论，不难发现，作者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具象的现场感知力始终从行文中明显地浮现出来。在对刘亮程创作历程的回溯中，季进聚焦在其如何“以一种世界性的叙事方式，讲述或遥远或切近，或真实或虚幻的中国故事、新疆故事和村庄故事”；读王尧的《桃花坞》，季进敏感于文本中流动的“空间”，而对于“空间”的理解，融合了季进多年研读西方文论的经验，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作者如何将“桃花坞”从地理空间形塑成一个历史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为小说中一再出现的那句“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有桃花坞”做了另类的注解。

季进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亲历者，又具有从外部观察的视野。他清醒地意识到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会有因为中西方学者的“视差”所导致的在观念、材料、方法或价值的层面产生“错位”，进而认识到对“中国性”“当代性”“文学性”“世界性”四个方面的重新辨析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海外世界如何认识中国的“真实性”，更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形象、意义、特征和价值。思辨和理智的力量与丰沛的情感交锋，形成了鲜明性的知识分子评论风格。

季进在学术研究中的许多观点，都在其文学评论中得到了实践与验证。他曾提出中国文学在海外世界的传播研究里，有一条路径是“史化观察”，并将其细化为“总体描述”和“局部深描”。前者集束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后者体现在他的作家作品论里，但二者是彼此的依靠和佐证，它们互为注释，双向奔赴。这里有必要深究一下“深描”一词。这是文化人类学者格尔茨提出的命题，核心要义在于拒绝对所谓的客观事实的简单描述，意图对其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阐释，从还原动作或话语的发生情境出发，揭示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意蕴。这样的“深描”，对于有着“内部”体验者和“外部”观察者双重身份的季进而言，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打通具体的文学评论和宏观的文学研究的特殊通道。

在对迟子建的小说《白桦黑花耀与碎桥》的解读中，季进重申了本雅明对于“讲故事的人”的论断：“本雅明忧心忡忡的是讲故事的人失而不得，以致故事无以为继，只留下混乱的信息爆炸。迟子建似乎提出另外的想法，即讲故事的人从来恪守本分，唯独听故事的人，已无心故事本身，而是不断挑战故事的‘真实性’，只注意信息的捕捉。”季进敏锐地意识到，在本雅明所处的语境中，其担心的灵韵消失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不再全情投入，而迟子建的小说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映射出，故事的困境是现实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受到了侵蚀。小说以现实镜像的身份激活理论，这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深描”，令人想起季进的一篇重要文章《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和“走回来”》。

这本文集及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却难以绕开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世界的语境中自处和发展，中国文化又如何在世界中确定身份。季进为我们示范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要走出去，也要走回来，这个过程，要保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也要打开视野，在误解中抵达理解。

艺术史家柯律格曾经写了一本《回音室》，探究的是在以“气韵生动”为代表的中国画论传播到海外后又重新被译介回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画是如何被不断形塑和界定的。季进的研究谱系，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论到宏观的学术研究，也暗自生成了一个微型但类似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音室”。他有意消弭我们在与世界对话时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季进的文学评论，正视了这种不确定性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图景的必然属性，因为不同文化间的壁垒虽不可消除，但是在互相的对话中，彼此的特点会因为碰撞而愈加明晰。因此，世界文学本身并非一个工整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幅不规则的、不断变动的地形图。恰如柯律格在《回音室》的引言中提到的：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因缘际会，不会让我们发现其中的关联源自“共同的历史，也来自不可预期的平行发展，以及不可思议的协调时刻”。《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本论文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演绎了一种“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可能。

(作者系《上海文学》副主编)

文学的「回音室」 ——读季进《世界中的当代文学》

□朱颖燕

■短评

倾听大地的心跳

——读许辉散文集《我为什么喜欢在水边走》

□韩进

许辉的《我为什么喜欢在水边走》收录了他最近五六年间发表的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深厚的9篇散文，包括《我为什么喜欢到水边闲逛》《我为什么喜欢在路边走》《我为什么喜欢到野外闲逛》等篇目。许辉以三篇“我为什么喜欢”的独白式文本，依托本真原始的生命本貌、扎根俗世的日常生存、看淡得失的通透心境三种生命姿态，搭建起其文化散文的三重精神维度，清晰呈现出从保有天性的自然人，到浸润人文素养的读书人，再到内心澄澈、通达世事的理想人格的精神成长路径，贯穿着对从容纯粹的生命追求的坚守。

行走水边，寻找有灵且美的生命节奏。人首先是自然之子，行走水边是生存常态。“我为什么喜欢到水边闲逛？”因为“我离开水边的时间太久了……必须要暂时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到水边走一走了”，一旦回到水边，我“整个人，立马就恢复了活力，立马就脚步灵便、脑筋好使、目光炯然、神态清醒、思路清晰、意志坚定了”，我“沿着河岸走，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时间表。水声或急或缓，像大地的心跳”。这种行走让人回归到人类与自然最原初的生命联结，获得了感官的全面复苏，对时间节奏的感知也出现了转变，恢复了生命体验的鲜活与完整。当自己的双脚踩在泥土上，“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分割的存在——不再仅仅是思考的大脑或劳作的手，而是一个完整生命体，与大地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种完整感，正是被现代社会分工异化的“自然人”所渴望回归的状态。

文化行旅，激活绵延五千年的文化记忆。当行走从本能需求升华为自觉实践，便进入了第二重境界。“中国的江河不仅是地理的，更是历史的。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传说、诗词与记忆。”在行走中可以发现历史：“黄河是一条政权之河，长江是一条经济之河，而淮河则是一条思想之河。”黄河、长江、淮河……这些水系不仅是地理标志，更是民族记忆的存储器，对沿岸的风物、民俗、传说的描写，使行走成为文化寻根之旅。从孔子的“知者乐水”到老子的“上善若水”，从孟子的“观水有术”到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庄子的大鹏“水击三千里”到《淮南子》的“水积而鱼聚”，水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象征系统。行走是与历史文本对话，与集体记忆对话，也是与中华文化的精神对话。

许辉文化散文主旨的深邃处乃是展示“一种与天地自然相化互生的洒脱、纯净人生哲学的追求与践行”。在作者看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养成一颗圣人之心，形成理想人格，正如荀子所言：“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当我长久行走，看惯四时变化，理解万物有律，我对生命生出一种更深的悲悯——对一草一木，对陌路生人，甚至对自己的局限与脆弱。”

这三重境界的融合构成了许辉文化散文的核心价值。“行走”是活着的最好标记，“活着”是为着更好的“行走”，生命与灵魂要一同在路上，永远的行走者也是永远的思想者。这样的文化散文避免了单纯的记游写景、触景生情或抽象玄思，以“行走”这一具有高度智慧与深刻哲思的意象，为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多重文化价值的引领。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

■新作快评 了一容中篇小说《寻找故乡》，《人民文学》2026年第5期

了一容的中篇小说新作《寻找故乡》围绕返乡主线，深入探索人类生存的本源问题，以“碗土传说”为核心象征，通过对家族口述史、草原文学智慧与现代性返乡体验的书写，将个体的乡愁升华为对游牧文明生存逻辑、文化记忆传承与现代性语境下身份重构的深刻叩问。

作品采用了“现在—一过去—一现在”的环形叙事结构。开篇描写了贝儿的死亡，结尾处讲述了贝儿的返乡，中间详述了家族迁移到阿勒坦草原上的种种经历，运用时空交错，将四代人的生命轨迹编织成一曲关于“离开故乡—怀念故乡—返回故乡”的复调乐章。这种结构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让过去与现在、迁徙与扎根、执念与和解在小说的叙事中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

作品以“世上再也没有贝儿这个人了”开篇，将叙事定格在贝儿离世后的当下。贝儿面对父亲贝儿弥留之际反复念叨的“大碗投”，内心弥留情感与现实的双重困惑：他生于草原、长于草原，对“大碗投”毫无故乡概念，却要背负着父亲临终的遗嘱。小说将这种父子代际间的隔膜具象化为贝儿“眼前一片白茫茫的空”，为后续家族史回溯与返乡叙事埋下伏笔。中间部分讲述家族的迁移历史与在草原扎根的经历，以贝儿的口述为主要线索，回溯了老老贝儿、老老贝儿一家从“大碗投”出发，最终落脚于阿勒坦草原的迁徙历程。这段叙事将整个家族的苦难与草原的诗意交织在一起，完成了对游牧民族迁徙历史的诗意重构。老老贝儿的迁徙不是对故乡的有意逃离，而是“寻找一个地方停下来”的生存本能，在阿勒坦草原的接纳下，转化为对草原的归属与认同。

乡愁是否还会存在？ 当故乡不再遥远， 乡愁是否还会存在？

□许峰

在家族坟茔前完成了与父亲、与家族记忆的和解。在“寻找故乡”的表层叙事下，小说蕴含着多重思想内涵，层层递进地叩问了迁徙文明的生存伦理、身份认同与现代性命题。

小说在迁徙与扎根的矛盾之中，呈现出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存选择。迁徙是游牧民族基于自然节律与草场生态形成的族群生存本能，扎根是迁徙行为的精神落脚点与价值归宿。老老贝儿一家的迁徙，始终携带着“寻找故乡”的文化追求，游牧文明正是在永不停歇的移动与栖居的往复之间，完成了生存空间的重建、族群记忆的接续与文明根脉的延续。草原承载了贝儿的成长记忆与生命体验，已成为与他血肉相融的现实栖居原乡。他在父辈口耳相传的家族历史与文化叙事里，继承了对祖源故土“大碗投”的执念与向往。这种“生于斯、长于斯，却心向别处”的错位身份困境，是游牧民族在世代迁徙、空间流转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性文化认同焦虑的体现。

贝儿既认同草原作为安身立命的生命故乡，也共情并接纳了父亲对“大碗投”故土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实现了双重文化身份的圆融统一，也昭示着新一代游牧人兼具根性坚守与流动视野的开放性文化胸襟。

贝儿乘坐高铁返乡的过程，也是他直面现代性的过程。窗外的工业景观、飞驰的列车与记忆中节奏舒缓的草原生活形成强烈对比。现代化的交通让“寻找故乡”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贝儿的困惑正是现代性语境下迁徙文明面临的现实之问：当我们心心念念的故乡不再遥远，那种深植内心的乡愁是否还会存在？小说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乡愁早已超越了地理空间，成为一种精神存在。《寻找故乡》告诉我们，故乡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在迁徙中不断重构的精神原乡，是一种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记忆，也是人类面对现代性洗礼后的多元文化体验。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